

“国宝卫士”谢辰生

■叶廷芳

去秋应邀赴浙江建德市参加关于古村落保护的研讨会，进会场时才发觉谢辰生先生又来了，不禁又喜又惊。说“又来了”，是因为此前四年在苏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古村落保护研讨会，他就是主角；喜中带“惊”，则是说这位已近“米寿”的老人近年来一直被那个令人生畏的顽疾纠缠着，却始终缠不住他的腿，压不住他的心；该去的地方他照样去，该说的实话他照样说。难怪被媒体誉为“国宝卫士”，而国家则授予他“文物保护终身成就奖”——享此殊荣者，全国仅两人耳。

谢辰生先生年轻时即与文物结缘。最初在上海担任著名文学家兼文物大家郑振铎的助手。解放后郑振铎作为首任文物局长，首先任命其高足谢辰生为文物局业务秘书。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文物流失极为严重。他奉命整理国家文物库藏，并参与起草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为他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1982）的起草者和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的主撰者打下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郑振铎的指导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不惜重金，为我国大量国宝级文物从海外的回归立下了汗马功劳。诸如现藏故宫博物院“三希堂”中的两件珍宝《中秋帖》（王献之）和《伯远帖》（王珣）等，都是他的心血的见证。

如果将谢老整个文物保护生涯比作一首交响乐，则至少有两个“华彩

乐段”分别出现在“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在刚才讲的“第一乐章”里，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第四乐章”则发生在他退休后的20年里！其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堪称是建国以来文物遭受的最严重时期，按谢老的看法是基于“文革”。主要现象一是盗窃文物成风，二是人为破坏空前。如果说对于前者必须依靠司法干预，那么对于后者他就责无旁贷了。这20年来，一方面国家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到处发生，文物往往为建设让路，成了牺牲品；另一方面，这20年来国人文物意识正在觉醒，但又远未完全觉醒：知道要保护，却不知道“如何”去保护；往往“保护”的结果，反而是破坏！最常见的现象是：维修文物不是“修旧如旧”，而是简单地修葺一新，完全不尊重文物的基本品格——历史的原真性，以至像八达岭长城修得跟新的一样；再一个是对于不可移动建筑的遗址动辄重建、修葺，追求复古，以至像圆明园遗址这样重要的侵略者的“作案现场”也要动脑筋“重修”，完全无视国家文物法第12条的明确规定；还有一个，也是最严重的现象，是在“旧城改造”中热衷于大拆大建，追求焕然一新，全然不顾城市文脉的维护与延续。针对这种种现象，谢辰生先生不顾年老多病，仍怀着

一个文物工作者的高度责任心，以天下为己任，大声疾呼，竭力制止，而且经常亲临第一线。如2007年7月22日下午，86岁的他偕同79岁的考古学家徐莘芳先生，顶着烈日，亲自跑到北京市“玉河改造”工程指挥部，规劝对方不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拆建改造，使对方深受感动，认真向上级作了汇报，使原计划得到修改，从而保护了一批古建筑。但毕竟他不在政府领导岗位，许多事光靠个人呼吁是不起作用的。为此他写信向有关部门及时反映或提出建议。仅最近这二十余年里，他向中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写的紧急呼吁信件就数以百计（近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其翔在会上宣称：仅他手里就有谢老的信函80多封），多数信件引起各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批复，包括温总理关于北京古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批示，这就把大量重要文物从岌岌可危的险境中抢救了出来，不啻是“虎口夺食”。

有一事是需要加以“特写”的，那就是制止长安街的最后一次毁灭。去年春，当他获悉北京市为迎接国庆60周年庆典，制定出一项为期两个月的“秘密紧急工程”，拟将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向西至六部口200米段南推20米，辟为草地，并将长安街南侧石碑胡同等十余条有价值的老胡同统统拆光，为此几百户居民必须紧急拆迁。谢老十分焦急，先后两次直书党和国家主要领导，指出这一片旧建筑恰恰是长安街仅有的残存古都风貌，

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一计划不仅“破坏古都风貌”，而且“劳民伤财”。温总理根据他的详尽而有说服力的陈述，批示“还是要听一听谢老的意见”，这一带的包括元大都南城城墙遗址在内的历史记忆才被保住。这是赤胆忠心得到的回报。

如今的谢老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专业过硬，对文物的理念经得起学术推敲，定性、定位准确。一次和他一起接受媒体采访，当记者提到兔首、鼠首“这两件国宝”时，他马上纠正说：“哦，国宝算不上，因为这两件艺术品本身艺术价值并不高；它们的价值是文物，可以见证圆明园那场劫难。”

关于圆明园遗址近年争论激烈，对此，谢老的观点明确而简洁：圆明园，“就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去年我陪一位瑞士著名文物专家参观后，他也认为，保护这一“震撼人心的世界遗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它赤裸裸地保留在那里”。

关于古城保护，谢老强调，光保护某些文物单体是不够的，必须保护它的原生环境；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必须保护它的文脉和肌理，因此必须整条街道、整片地段地保。

谢先生的这些重要观点均已被接受。现在北京古城已划出40个片区区作为保护对象，加上某些文物个体，占了北京古城总面积的40%。

谢辰生先生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不仅在业务工作中忠于国家和人民利益，

坚持科学精神，而且在政治生活乃至个人生活中都表现了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廉洁奉公的气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1980年前后的一件奇特的往事。那时在胡耀邦总书记的主持下，全国正在纷纷平反冤假错案。但在文化和文物系统却平添一件冤假错案：人们纷传原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文革”中曾为康生“搞了大量文物”，并蒙江青“赏吃螃蟹”！一时满城风雨，使王老深陷痛苦。谢辰生见此极为愤慨。他要为这位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辩诬，遂即奋笔直书三千余字，直送胡耀邦总书记，甚至惊动最高领导，经过一年多的组织审查，终于让这位老局长接到“没有问题”的正式通知。这时，老局长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见他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如今的谢老在文物界一言九鼎。在我们这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物自然要成为某些谋利者的“工作”对象：提着贵重的物品甚至现钞上门“看望”。但造访者哪里知道，这位精瘦的老者一生素衣淡食，廉洁奉公，对这类“美意”从来是不领教的！他们每每不得没趣地把“攻关武器”撤回。有时谢老生在拗不过这类“攻关手”，只得暂且收下。但等客人一走，他赶紧紧上礼物和沉甸甸的一袋现金去单位，交给纪委，让国库“享用”。

去年夏天曾去谢老家走访。走进那间约15平米的房间使我大为惊讶：这竟是一间“多功能”的用房！它既是老人的工作室和客厅，又是他的书房，而且还充当卧室！怎么能把一个国宝级的专家蜗居在这样局促的地方？我愣了半天，带点打抱不平的口气问：“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向单位要一个宽敞一点的环境？”他淡淡地说：“住多年了，习惯了。”看我许久接不上话，他又补充说，“工作那么忙，哪有工夫考虑别的。”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您记挂着那许许多多的国家宝物，唯独忘了自己！

2004年12月，中国美术学院于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清园书屋笔札展”，同时还举行了汇集展出作品的《清园书屋笔札》一书首发式。王元化先生时年84岁。

这次展出的51幅书法作品，皆为王元化先生著作语要的抄录，内容及思想、行旅、往事、谈艺、诗作、楹联，所有墨的均由元化先生于当年夏秋之际挥毫而就。此事沪上多家媒体作了报道。许江先生在介绍文章中写道：“王先生的笔札的意义首在为文与书写的敬正。这些文字作为语要及其思想的载体，有书写的清纯、有运思的节度，蔚然而成横正的气象，披露一代思想者的胸襟。”这段文字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正是“敬正”二字。

然而，在王先生的眼里，这并不是是一次成功的展出。2005年3月，他在《与友人谈笔札展》的短文中说：“我同意友人为我举办这个展览会，是由于我觉得目前的空气太沉寂了，我想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为布满枯藤败草的沙漠，提供几点清水，使人感到活在这个世上还不太寂寞。现在这里充斥在传媒上的，大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文字和图像。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冒出一点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点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展览会办了约半个月，参观的人不少，然而多半是来看热闹

的，能够接受我那点用意思心的，恐怕鲜乎其微。”王先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参观留言簿上涂满了类似“到此一游”的字句，甚至有的画上一颗心以表情侣双双爱过的意思。王先生面对此状“啼笑皆非”，以至于感到“伤心和失望”。是的，尽管展览主办方已经有了提示，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的“敬正”氛围。

“敬正”是元化先生为人精神的写照，也是他对学问和编辑、出版、装帧等事宜的态度和追求。

曾担任多部王元化著作责任编辑的高国平先生回忆说：王元化每编一部书，不仅对内容要进行反复斟酌、修改补充，对书的外在形式，如封面、版式、字体、用纸等也很讲究。当年，《思辨随笔》的样排排出来后，他对版式和字体不满意，按他的意见又重新进行了设计。他从海外一本书得到启发，提出了封面设计方案，还亲自到出版社对负责封面设计的袁银昌提出具体要求，又将袁叫到家里谈过几次，并找出马修斯的画集交袁参考。书出来以后，有些印得颜色深浅不一、套得不准，他一直难以释怀。后来多次重印，一次比一次好，他才露出了笑容。元化先生承认自己是比较“吝啬”的。他以艺术品的要求来衡量书籍，追求内容形式的完美和谐。《思辨随笔》有繁体字和简化字两个版本。电脑排版虽然快速，但是转码后无法“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这样一来，“母后”变成了“母后”，“乾隆”变成了“千隆”，以致不改姓、防不胜防。元化先生和编辑都十分忧虑，审读校样时“如履薄冰”、“如临大敌”。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申报国家图书奖时，经专家检查，《思辨随笔》的编校质量达到了国家规定标准，差错率是万分之零点二。元化先生知道后，笑得很开心，说：“这是你们出版社的功劳。”为了满足部分学者收藏的雅兴，《思辨随笔》还印制了数量极少的毛边本，古朴典雅，可视为珍品。资深出版家郝铭鉴先生认为：王先生是个让编辑非常渴望拿到其书稿，但是转码后会一直紧张不已的作者。这种看似挑剔的要求，对别人，也更针对王元化自己。他总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常常为了某个字，半夜打电话与编辑探讨。王元化的思想严谨和文字严密，形成了高度的统一。

陈念云先生在《王元化与书法》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王元化与书法艺术的渊源关系，并特别提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1997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拟出版王元化的《读黑格尔》一书，编辑们看到了二十多年前他被隔离审查时在练习簿上记下的读《小逻辑》的笔记以及读《美学》的笔记，共三百多页，三十多字，虽然是钢笔字，但写得清楚端正，很是好看，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涂改，就认为与其排印出版，不如就将这笔记影印成书，让此书既有阅读价值，又有一定的欣赏价值。这就是王元化《读黑格尔》一书为什么会影印出版的由来。当然，这完全应该归功于王元化当年练习书法时打下的“童子功”基础。这套读书笔记现已由上海图书馆作为名人手迹收藏。

二、古色古香的《清园文稿类编》。此书1999年先由浙江华宝斋书社印制，2000年1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初版印刷五百册。《清园文稿类编》为线装古式本，一函十册。全书着重收录王元化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分为文学、黑格尔、文心雕龙、考释、思想史、戏曲、文物、书信日记、序跋、学术年表和著述目录十部分。不同于一般的文集，此书还选录一些较为重要的他人评论和引征文字附于作者各类文章之后以作参考，有的则加上编者按以交待所写文章或评论材料的背景。有意思的是，王先生曾为此书每页印14行好还是12行好答说：12行好。

三、意蕴别致的清园藏书票。根据出版社和编辑王为松先生的回忆，王元化曾请专人制作藏书票，上面书写“寒风飞而翩跹，都云起乎翰林。清园王元化藏书”。这种意蕴别致的藏书票，为书籍增色不少。

四、自制的《京剧与文化传统从谈》特藏本。1995年10月，元化先生在《新民晚报》上连载发表《京剧与文化传统从谈》，每天一个小标题，全文包含了13个颇具特色的小标题。王先生对这篇二万字左右的文章，进行了认真修订，并特地自制了50本线装特藏本，以赠送友人与图书馆。

2007年11月30日，医院病榻上的元化先生收到了一份最令他欢喜的生日礼物：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特别赶制的30本羊皮精装本《读苏比亚》。面对这部真正的敬正之书——他与妻子张闻60年相濡以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元化先生内心的感受是可以想见的。

对自己的书和文字负责，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负责和担当。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元化先生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审美立场。这种“敬正”之美，让人肃然起敬。

主编/刘绪涛 副主编/周毅 责任编辑/舒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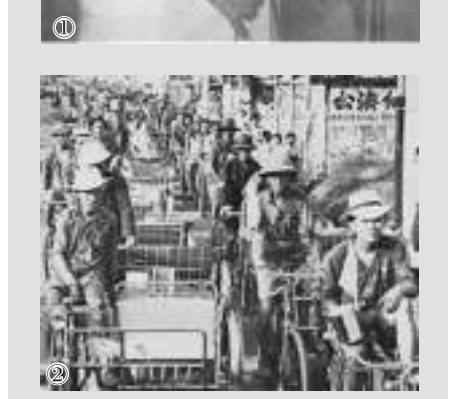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陶恒生

上世纪50至70年代，东南亚曾经出现过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它是南洋各界侨集体募资、倾力筑造的高等学府，为千千万万的华裔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升学机会，更为南洋华人社会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它本应得到所有爱护中华文化的人们支持与呵护，然而很不幸，它的生命是坎坷而短暂的，25年的跌宕起伏，终因不睦政治压力而黯然倒下，留给后世无穷的追思和惋惜——这就是南洋华侨先贤陈六使创办的南洋大学。

校园工人出身的陈六使

南洋华人领袖、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企业家陈六使（1897—1972）（图1），原籍福建同安集美村，幼年就读于村中集美小学，19岁随胞兄陈文确南渡马来谋生，在乡长陈嘉庚的谦益橡胶公司当胶园工人，后调至新加坡橡胶厂任文员业务学习买卖。1924年，27岁的陈六使已经熟谙橡胶技术及经营业务，遂离开陈嘉庚自立门户，与兄文确合创益和橡胶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分支机构遍及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地。除橡胶外，陈六使投资保险、银行、造纸、水泥等，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与侨商领袖。他还担任陈嘉庚创办于1924年的《南洋商报》董事长多年，1983年《南洋商报》在新加坡政府的压力之下与另一大报《星洲日报》合并，即今天的《联合早报》。



英国人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建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基地。1824年把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地合组为“海峡殖民地”，由英人总督统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统完全露出英国制度，因此政府公务员、学校校长教员、洋行职员等，除了高级官员及主管是英国人外，其他中低层职位几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以及一些来自印度或锡兰的英籍子弟担任。

1860年，来自中国福建的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会馆，1906年开始创办第一间华文学校供华人子弟就读。1950年，新加坡、马来亚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成立，陈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币30万元，但是华校中学的毕业生却没有资格报考。读中文学校的华人工子弟在新、马没有地位，进不了政府机构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被读英文说英语、具有强烈优越感的英文学校毕业生所歧视。

陈六使有鉴于华文中学生升学无门，华校子弟全然被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乃于1953年1月在福建会馆执监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他率先捐献叻币500万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美金200万），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他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承诺捐出面积520英亩的大片会馆土地，作为建校之用。福建会馆常委李光前也概允认捐实收捐款总额百分之三十。

陈、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侨界社会热烈响应，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华商联合会带头公开支持建校的各种社团达279家。二月，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南洋大学”，并邀请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筹划建校事宜。新加坡、马来亚各界呼吁捐款建校的运动随即展开，华侨居民们无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来。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贩们更发动各种“义卖”活动：三轮车“义踏”（图2）、的士（出租车）“义驶”、理发师“义剪”（图3）、大排档“义炒”等等，收下的义款虽然是些零星小钞，却是积少成多，众志成城，而这一切义举更刺激带动了大商号、富裕人家更多的捐款。

5月5日，南洋大学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名义正式获得英国殖民政府准许注册，取得法人地位，随即成立“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推举陈六使任主席。7月26日，南洋大学正式在福建会馆赠地“云南园”举行奠基典礼（图4）。陈六使在典礼上慷慨发言道：“我们是在这块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华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被淘汰。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仍然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他后来尝说：“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于新马而言财富，充其量试忝列丙与丁间，乃窃不自揆，仍然倡办大学，是何异一簞之士妄求为九仞之山？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持我三百多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壮哉斯言！

敦聘林语堂出任校长

为了把南大办成东南亚第一流的华文大学，南大执委会决定向国外敦聘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长。执委会敦请前北大校长胡适及清华南大校长梅贻琦，均未能成功，最后请到了在美国办《天文》杂志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林博士是闽南人，早年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当过教授和文科主任，因此与南洋福建华侨颇有渊源。林博士受聘后立即在美国网罗了一批教授和管理人员共11人（包括黎东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渊博士、严文郁博士等）欣然就道，前来新加坡上任。

1954年10月2日，林语堂一行人抵达新加坡，受到侨界的热烈欢迎。第二天，由陈六使、连瀛洲、高德根等华侨领袖陪同，在中华总商会举行记者会，宣布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和方针。林校长带来的创校精神和计划，的确是办理一流大学所必备的条件。然而在现实环境里，他的期望与南洋华侨们的单纯想法存在着先天的差异。首先，在落实建校项目的顺序上，便发生歧见。林语堂主张在开学前必须购备大量图书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切不可因陋就简，草草开课，否则南大将是一所基础薄弱的学校；南洋诸公则辩称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不妨边开课边建设。其次，林语堂到任时校舍已经开始兴建，他发现校园布置和校舍功能的设计，与理想无甚差距，事前既无人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也竟无置喙的余地。尤其对于校舍未来规划

即行发包，而包商又是执委会中人，十分不满。

南洋华侨对于林语堂博士以及随他而来的教授们崇敬有加，视之犹如神仙下凡。他们很难了解为何办一间大学，还有比老师教课学生上课更重要的事要先做。更没想到用那一点一滴捐来的钱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这批国外学者专家之一顾。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林语堂开办学的出发点只是纯学术的，他颇不屑于商人出身的执委会的一些行事作风。另一方面，华侨们办大学的目的是现实的，他们急于打开高中学生升学之门，以商人的立场自然也考虑到大学办成后的外围附加价值，例如带动附近市面繁荣、土地增值等。

这种理念的分歧，在林语堂向执委会提出第一年需叻币一千万元的建校预算案后，达到高峰。1955年2月17日，执委会开会讨论这份预算，认为金额超过预期一倍，要求删减。林语堂则坚持必须按预算执行，增加预算乃是执委会的责任。这些大小争执，逐渐从会议室内的争论延伸到媒体上的互相攻击，更进而形成林、陈之间的对立。3月25日，陈六使在执委会上坦承折冲失败。4月3日，林语堂宣布辞职，并要求结算他及他带来的教职员三年聘约的全部薪金。陈六使自己支付了这笔巨款，并未动用华侨捐款的南大建校基金。4月17日，林语堂一行离新返美。

南大开课，华生升学有门

风波既过，大学先修班于1955年6月开课。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入学新生584名，分别就读于文学、理学、商学三院，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陈六使在开学典礼上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华人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

然而好事终归多磨，这年5月2日，新加坡教育部指出南洋大学没有法定权力颁发大学学位。虽然如此，南大校园内的各种建校活动并未稍歇。

1958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大学的图书馆大楼采用中国宫殿式的设计，红柱白墙，充分显现海外华侨对于中华文化的尊崇与向往。3月30日举行开幕典礼，陈六使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共同为南洋大学落成纪念碑主持揭幕。1959年初，新加坡政府下令成立一个名为“白里斯葛评议委员会”的五人小组来南大考察，就大学的组织、行政、课程、教职员、考试、学生生活等提出评估和建议。五位委员为西澳大学白里斯葛教授、哈佛大学教授洪根连、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盛威、菲律宾宾东方大学教授谢玉铭。

也就在这一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大胜。6月3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7月22日，政府发表白里斯葛报告书，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第二天，政府委派魏雅聆医生组成另一个检讨委员会以评估白里斯葛报告书。11月，魏雅聆报告书出炉，对南大提出诸多负面批评。12月31日，南大秘书长潘受辞职。

1960年2月9日，政府正式发表魏雅聆报告书，建议重组及改进南洋大学，包括由一个临时理事会接管南大，解散执委会与行政委员会，撤销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从此，政府当局与南大之间为了学位问题，发生纠缠不断的争议。

4月2日，南大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共437名。陈六使在典礼上致词说：“俗语说：万事起头难。试翻翻世界各大学历史，有哪几间比我们南大的产生，遭遇更多的障碍与困难？又有哪几间的兴起，比我们南大起得更稳健、发展得更迅速？……南大初办期间，能达到这种境地，是值得欣慰的。”

1962年，第一届南大理事会成立。全体理事公推陈六使为理事会主席。

1963年，入学新生增至2324名。9月，新

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再获大胜。9月22日，陈六使因个人政治理念及学生选举倾向问题，于选举结束第二天，被政府吊销公民权。陈六使随即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为由请辞理事会主席。

心力交瘁，六使含恨弃世

在陈六使担任南大理事会主席的12年间，对于校舍建筑、师资聘请、图书仪器之添购、教学质量之提升、学生学位之争取、校园福利之增进等方面，无不为学校的发展与前景殚尽心力。然而他的去职，多少还是与政府当局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有关。

李光耀执政期间，始终怀疑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是“投奔于共产主义”者。在他眼中，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园主，他大力维护华语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至于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一事，李光耀坦率地说：“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以上摘录自1998年版《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454、247、382—383）

1972年9月11日凌晨，陈六使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东寓所，享年76岁。15日出殡，参加执拂的南大学生与各界人士达七千余人。

1974年6月15日，南洋大学在校园举行安置陈六使纪念铜像典礼，陈氏家属即席捐献南大新币50万元，充作陈六使奖学金基金。

1980年夏季，新加坡政府下令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这所屹立于东南亚25年，为南洋华侨造就无数子弟的华文最高学府，就此走进历史。

1981年，南洋理工学院在南大原校址成立。1991年，该校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仍然简称“南大”。



鳳凰古城写生

(国画)

崔晓东

革命

·记录·

